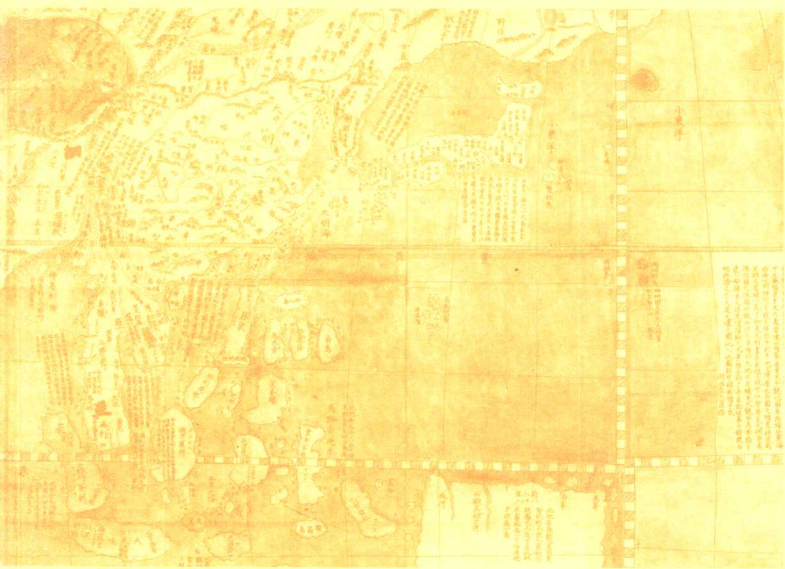


◎ 孙江 主编

亚洲概念史研究

第4卷



◎ 本卷主编
李恭忠 孙江

亚洲概念史研究

第4卷



 商务印书馆
创于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亚洲概念史研究·第4卷 / 孙江主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ISBN 978-7-100-15910-4

I. ①亚… II. ①孙… III. ①亚洲—历史—研究—丛刊 IV. ①K300.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42267 号

南京大学双一流经费和人文基金资助项目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亚洲概念史研究

第4卷

孙江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5910-4

2018年5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张 20%

定价: 78.00 元

孙江

南京大学学士、硕士，东京大学博士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历史学院教授

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院长



《亚洲概念史研究》

主 办 方：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字母为序）

- 阿梅龙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
陈力卫 日本成城大学经济学部
陈蕴茜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方维规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冯 凯 德国汉堡大学汉学系
韩东育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胡传胜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学海》编辑部
黄东兰 日本爱知县立大学外国语学部
黄克武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黄兴涛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李 帆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李恭忠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李炯丘 韩国翰林大学科学院
李里峰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
梁一模 韩国首尔大学自由研究学院
林少阳 日本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
刘建辉 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
闫小波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潘光哲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彭南生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沈国威 日本关西大学外国语学部

石 斌 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史易文 瑞典隆德大学中文系
孙 江 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
王宏志 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
王马克 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汉学系
王晴佳 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
王月清 南京大学哲学系
王中忱 清华大学中文系
杨念群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张凤阳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章 清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朱庆葆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编辑委员会

主 编：孙 江

编 辑：王 楠 于京东 石坤森

助理编辑：徐天娜 闵心蕙 王瀚浩 宋逸炜

开卷语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历经“语言学的转变”之后，由不同学科条分缕析而建构的既有的现代知识体系受到质疑，当代人文社会科学正处在重要的转型期。与此同时，一项名为“概念史”的研究领域异军突起，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概念史是反求诸己、推陈出新的必经之路。

“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Conceptual History)一语最早见诸黑格尔《历史哲学》，是指一种基于普遍观念来撰述历史的方式。20世纪中叶以后，概念史逐渐发展为一门关涉语言、思想和历史的新学问。从概念史的角度来看，概念由词语表出，但比词语含有更广泛的意义；一定的社会、政治经验和意义积淀于特定的词语并被表征出来后，该词语便成为概念。概念史关注文本的语言和结构，通过对历史上主导概念的研究来揭示该时代的特征。

十年前，本刊部分同仁即已涉足概念史研究，试图从东西方比较的角度，考察西方概念如何被翻译为汉字概念，以及汉字圈内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概念的互动关系，由此揭示东亚圈内现代性的异同。当初的设想是，从“影响20世纪东亚历史的100个关键概念”入手，梳理概念的生成历史以及由此建构的知识体系，为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石。但是，阴差阳错，力小而任重，此一计划竟迟迟难以付诸实行。

十年后，缘起石城，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先后于2010年和2011年主办两次“东亚现代知识体系构建”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各国的学者围绕概念史的核心问题展开了热烈辩论。本刊编委急切地认识到，要想推进概念史研究，必须进行跨文化、跨学科的努力。

本刊是通向概念史研究的一条小径，举凡讨论语言、翻译、概念、文本、分科、制度

以及现代性的论文及评论,皆在刊登之列。通过出版本刊,我们希望达到如下目标:首先梳理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生成与流变,继而在东亚范围内进行比较研究,最后在全球史(Global History)视野下,从中国和东亚的视角与欧美学界进行理论对话。

本刊将本着追求学术、献身学术的宗旨,为推动撰写“影响 20 世纪中国及东亚历史的 100 个关键概念”做知识和人力准备,诚恳欢迎学界内外的朋友给予关心和支持。我们不敢自诩所刊之文篇篇珠玑,但脚踏实地、力戒虚言,将是本刊一以贯之的态度。

Verba volant, scripta manent(言语飞逝,文字恒留)。

《亚洲概念史研究》编委会

目录

代序：虫之目 鹰之眼…………… 孙 江(1)

基本概念

“主义”概念的哲学面向…………… 史易文(9)

一、作为指导原则的主义…………… (10)

二、被论争塑造的主义…………… (15)

三、作为社会运动指导概念的主义…………… (16)

“主义”的悲剧：五四前后报刊小说中的“人道主义”…………… 章 可(33)

一、引言…………… (33)

二、民国初年“人道主义”概念在小说中的出现…………… (35)

三、人道主义：男女平等和家庭问题…………… (38)

四、理念与现实：“主义”的悲剧…………… (44)

五、结语…………… (46)

近代中国的“资本家”

——以其概念之生成、演变为中心…………… 徐天娜(49)

一、引言：从两条定义说起…………… (49)

二、“资本家”的诞生…………… (50)

三、“资本家”的阶级化履历…………… (55)

| | |
|--------------------------------|---------|
| 四、“资本家”的他者身份 | (60) |
| 五、结语 | (62) |
|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中日首译本探析 | 盛福刚(64) |
| 一、张一兵和韩立新推断郭译本翻译时期的论据 | (66) |
| 二、郭译本的成书日期 | (66) |
| 三、日译本对郭译本的影响 | (67) |
| 四、郭译本的翻译底本 | (71) |
| 五、中日两国研究者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中应共同解决的课题 | (74) |
| 清末民初的“封建”政治 | 慕唯仁(76) |
| 一、“郡县”和“封建”的二元对立 | (80) |
| 二、清末的“封建”与“郡县” | (82) |
| 三、康有为对“封建”的重新解释 | (83) |
| 四、章太炎对康有为的批评 | (86) |
| 五、章太炎对进化论的批评 | (88) |
| 六、章太炎将“封建”作为西方“封建主义”的用法 | (91) |
| 七、《新青年》群体:陈独秀与胡适 | (94) |
| 八、结论 | (100) |

国 族

| | |
|--------------------------|----------|
| 祖国——一项基于近代西方语境的概念史考察 | 于京东(105) |
| 一、patria 概念的古典起源 | (106) |
| 二、中世纪的二元结构 | (109) |
| 三、旧制度下的三套话语体系 | (113) |
| 四、概念的革命:政治斗争与话语生产 | (120) |
| 五、结语 | (125) |
| 近代韩国的国民·人种·民族概念 | 姜东局(127) |
| 一、绪论 | (127) |
| 二、国民概念的连续性和模糊性:朝鲜后期—1904 | (128) |
| 三、人种概念的传播与接受:1895—1904 | (134) |
| 四、民族的登场:1905—1909 | (137) |
| 五、国民的强化:1905—1909 | (143) |
| 六、民族的胜利:1910—1919 | (147) |

| | |
|----------------------------------|----------|
| 七、结论 | (149) |
| 从Republic到“共和”:一个西方概念的中国之旅 | 李恭忠(150) |
| 一、从 πολιτεία 到 republic | (151) |
| 二、从 republic 到“民主” | (154) |
| 三、从 republic 到“共和” | (159) |
| 四、从“共和”到“假共和” | (170) |
| 五、结语 | (184) |

文 本

“四元为体”与“五行为用”

——从邵雍《皇极经世》到利玛窦《乾坤体义》的历史转折

| | |
|------------------------------------|-----------|
| | 徐光台(189) |
| 一、引言 | (189) |
| 二、邵雍以四象挑战五行 | (191) |
| 三、邵伯温的关键评释 | (197) |
| 四、宋代学者的回应 | (199) |
| 五、明代学者的回应 | (205) |
| 六、利玛窦对中国典籍和五行说的认识 | (207) |
| 七、利玛窦以四元素说挑战五行说 | (211) |
| 八、结语 | (216) |
| “福音”概念——17—19世纪汉译《圣经》文本研究 | 闵心蕙(219) |
| 一、“福音”新释 | (219) |
| 二、“Evangelium”=“万日略”？ | (221) |
| 三、“福音”概念的确立 | (230) |
| 四、从语词到概念 | (234) |
| 五、结语 | (237) |
| 从“造化机论”到“培种之道”:通俗性科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 唐 权(238) |
| 一、引言 | (238) |
| 二、通俗性科学传来前史 | (242) |
| 三、明治日本的造化机论 | (249) |
| 四、造化机论之东学西渐 | (258) |
| 五、近代中国知识人和电气说 | (273) |

六、结语 (283)

附记 (286)

书 评

19 世纪历史的全球史书写

——对奥斯特哈默《世界的演变》的几点认识 李雪涛(289)

时间、空间与概念史

——读科塞雷克《概念史的实践：时间化历史，空间化概念》

..... 杨 洋(307)

征稿启事 (319)

代序：虫之目 鹰之眼

孙 江

我们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似乎呈现出二律背反现象：一方面，可以说我们的革命知识太少了，已有的革命言说虽多，尚不足以反映革命历史及其时代的和超时代的意义；另一方面，正因为如此，也可以说我们的革命知识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已有的知识妨碍了我们深入理解革命。要解开这种二律背反的死结，首先要做的似乎不是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而是去学科化。所谓去学科化，强调撇开一切预设，借助文本回到历史现场，观察革命的生成过程，继而尝试使用学科方法给予一定的诠释。基于这一考虑，我以为革命史研究不应限于共产主义革命，而应放眼长时段、跨世纪的社会政治变动，将共产主义革命置于其中加以考察，揭示其深远的意义。在此，社会史的视角是必不可少的。

1992年，美国学者华志坚(Jeffrey N. Wasserstrom)在《社会史》杂志发表《中国革命的社会史研究》一文，将16至20世纪中国社会——涉及明代、清代、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的变化视为漫长的革命过程，并且使用大写、单数的“中国革命”(Chinese Revolution)这一术语来称呼此过程。他认为，美国学术界于中国革命研究的社会史取向，受到了“新史学”“新社会史”方法和观点的影响，论者多关注妇女地位、城市中的社会紧张、村庄权力关系中的文化要素等问题^①。华志坚所说的社会史是非常宽泛的概念，按照他的铺陈，社会史追求的目标必定是结构的历史、整体的历史。在该文发表前后，我恰好开始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革命，在梳理了社会史

^① Jeffrey N. Wasserstrom, "Toward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Review", *Social History*, Vol. 17, No. 1, January 1992.

研究的谱系、特别是吸收了“语言学转向”的成果之后，我理解的社会史，或者径称新社会史，与华志坚以及国内通行的理解大相径庭，乃是一种非结构的、非整体的历史叙述，与其说指称“历史”的某一特定领域，毋宁说是一种思考历史的方法，或可命名为历史现象学方法。

对于这种研究方法，哲学家利科(Paul Ricoeur)在《记忆、历史、忘却》一书结尾之处写下的一段话可为注脚：历史的背后/有记忆与忘却/记忆与忘却的背后/是生/但，书写生则是另一种历史/未完成^①。历史的背后存在记忆/忘却，后者是构成历史的母胎，而记忆/忘却又是与人的“生”(la vie)紧密关联的，思考历史和记忆就是思考生，这是历史现象学方法的出发点。确实，历史书写是在生与死、现在与不在之间展开的，书写者从自身所处的现在/生去捕捉不在的过去/死，所能借助的是口传和文字，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史料。书写者之所以知道革命，乃是因为存在着与革命历史有关的话语或文本，它们成为书写者接近革命现场的媒介。

现代意义的中国革命肇始于清末排满运动。1895年10月，兴中会在广州策划反清起事流产后，孙中山流亡日本。多年后，孙中山对陈少白回忆兴中会历史时说，起先并不知道何谓革命，是在神户登岸后看到当地报纸称自己为“革命党”，才知道原来是在干革命^②。陈少白的记录影响甚大，成为追溯中国革命源头的依据。但是，历史学者手中的史料如同律师递交给法庭的证据，必须经得起检验，否则就不能成为论据。日本学者安井三吉查阅了孙中山抵达神户前后的报纸，结果不要说神户的报纸，就是大阪的报纸，也没有一条关于革命家孙中山的信息，倒是发现了诸如“广东暴徒巨魁”来神户之类的消息^③。可见，当地报纸并没有将孙中山看作革命者，而是将其视为犯上作乱者。所谓革命，先有其事，后有其名。这个小插曲提示我们，不能随便使用后来的术语、概念去解释此前的事情或事件，必须用当时人的术语、概念来理解当时的事情或事件。

实际情形却并非如此。“越是重要的概念，越容易被滥用。”^④论者在溯及中国革命思想时，每每言及《易经》《尚书》，其中的“顺天应人”革命话语确实反映了中国人对政治的看法，但这个革命话语与《易纬》中的辛酉革命、甲子革令一样，早已成为死语，与实际发生的事情或事件并无关系。翻看《水浒传》可知，即使是吊民伐罪，也自称

① Paul Ricoeur, *La mémoire, l'histoire, l'oubli*,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00, p. 657.

②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年版，第12页。

③ 安井三吉：“「支那革命党首領」孫逸仙考：孫文最初の来神に関する若干の問題について”，《近代》57，神戸大学紀要，1981年12月。参见陈德仁、安井三吉《孫文と神戸》（增补版），神戸新聞総合出版センター1989年版，第34—35页。

④ Peter Calvert,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

“造反”，而非“革命”。革命这个词语是在近代语境下被重新激活的，甚至可以说是经由日本而来的外来语——revolution。即使革命这个外来概念，也直至18世纪末才被赋予现代意义，按政治学家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说法，因为现代意义之革命的诞生，“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不为人们所知或所闻的故事即将开始”^①。这个故事在中国的开始比欧洲晚了一个世纪，其本土化有一个过程。由陶成章执笔、最终形成于1908年的《龙华会章程》是排满革命党人动员秘密会党的文本，该文开篇即写道：“怎样叫做革命？革命就是造反。有人问我，革命就是造反，这句话如今是通行的了，但这革命两字，古人有得说过么，我答应到有的。《易经》上面，‘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就是这两字的出典。”^②文章继续写道：革命之所以被曲解为“造反”，并被指为“大逆不道”，乃是皇帝和统治者泼给革命的污言秽语^③。名为《江湖汉流宗旨》的文本出自哥老会，里面有段文字说得十分明白：“革命者，舍命拼命不要命也，未甚要公人革命，只因明了大害，装住一肚皮的忿恨怨气。满清皇帝尽用王亲大臣专权，尽买卖官当道，不顾民本。”^④

如果不是单从革命之名来理解革命，而是在社会政治变动中去理解革命，那么革命的内涵不但暧昧，其外延也颇为广阔。比如，清政府推行“新政”，将科举制度废止，这是中国皇权文官制度形成以来的大事，堪称一场制度革命。而被归入改良派的，也未必不是革命者，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具有革命倾向的人，康有为的一干弟子中欧榘甲就是一个。欧榘甲的《新广东》堪称一份以美国政体为模板的革命宣言，其在政治思想史上的意义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⑤。

如果说，横亘于现在与过去、生与死之间的实在距离妨碍了我们的认知，那么，我们对自身境况的不自觉，就让缩短距离的愿望变得遥不可及。在此，我要特别提出的是保持与研究对象的距离对于缩短距离的意义。话者或作者生活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中，会无意识地接受程式化的认知模式，把很多需要辨析的知识当成如如不动的自明的知识。我这么说是有所指的。放眼望去，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研究，有影响的著述大多不是出自中国人之手，而是外国人写的。外国人未必比我们看得多、理解得更深刻，但恰恰是这一弱点能使其对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刨根究底，从而有所发现。这里不妨以美国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Perry)的革命研究三部曲为例。20世纪80年代

① 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 Penguin Books, 1990[1963], p. 28.

② “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日本及日本人》第569号，1911年11月1日，第67页。亦见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9页。

③ 汤志钧编：《陶成章集》，第129页。

④ 《江湖汉流宗旨》，1912年刻，第48页。作者、印刷地不详。

⑤ 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

中期,我在读研究生时就阅读了她的《华北的造反者与革命者》,该书以100年为时段,从生态政治学的角度分别探究了淮北历史上掠夺的捻军、自卫的红枪会和革命的新四军等三种政治样态^①。我读后很是震动:主题是熟悉的,资料也是熟悉的,但何以中国学者没有如此想问题呢?20世纪90年代,我正在撰写博士论文,内容涉及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读到她的《上海罢工》,其中关于产业工人与非产业工人政治意识的辨析,以及二者在工人运动中不同作用的考察,对我的研究很有启发^②。其时,“冷战”结束不久,革命研究业已失去显学地位。日本学者田原史起回顾道:“现在的中国研究者不是在从事现状分析,便是在进行历史研究。对从事现状分析的人来说,革命已经不是‘现状’,对历史学家来说,共产党革命与中华民国史等相比,不是那种可以激发研究兴趣的时髦题目。”^③与日本学界悄无声息的集体出走相比,美国学界以周锡瑞(Joseph Esherick)为代表的学者开始重新检讨革命所带来的“解放”^④。裴宜理则反其道而行之,关注早期共产主义者在工人、农民及其家属中所进行的普及教育,所发动的高水平的“非暴力罢工”(nonviolent strike)^⑤。2012年,裴宜理出版了《安源》一书,阅读此书不难发现,在一片寂静中,作者却在寻找革命实践中被遗忘的传统^⑥。同年5月,我和李里峰教授在哈佛大学曾与裴宜理教授有过一次长谈,当时我劈头就问:你“革命”凡三十载,不疲倦吗?是什么驱动你不断“革命”的?裴宜理闻言大笑。我这么提问,背后是有问题意识的,即从她的研究中可以引申出两个关涉历史现象学的方法论问题:一是书写者如何捕捉革命的“星火”,从而切入革命历史;二是在理解革命历史时,书写者如何反躬自省现在的地平线。

1989年,贺康玲(Kathleen Hartford)和史蒂文·戈德斯坦(Steven Goldstein)共同编辑了名为《星火:中国乡村革命》的论文集。在长篇导论中,二人把美国的中国革命研究划分为四个不断递进的时期:第一个阶段(1932—1949)是充满多元和差异性的观察和研究。当中国共产党不断壮大时,美国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反而脱离了中国革命的现实,由此派生出“冷战”背景下“谁丢失了中国”(who lost China)的讨

① Elizabeth J.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 - 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② 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③ 田原史起:《二十世纪中国の革命と農村》,东京山川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④ Joseph Esherick, “The Theses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21(1), 1995.

⑤ Elizabeth J. Perry, “Reclaim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7 - 4, November 2008.

⑥ Elizabeth J. Perry, *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论。第二个阶段(1949—1962)除费正清等少数人关注中国革命的内部因素外,绝大多数研究都强调国际因素的介入,即列宁主义的“组织化武器”(organizational weapon)和日本侵略的“关键影响”(crucial impact)。第三个阶段(1962—1970)出现了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的原因是唤醒了农民潜在的民族主义,还是进行了社会改革的大论争。第四个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编者认为“我们处在中国革命研究的新的转折点,正在出现的新一代学者试图解决旧的争论,弥合对立的概念,在形式上加入各种独立的分析”^①。他们借用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形容中国共产党革命如散落在各处的“星火”(single sparks),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均呈现出“不连贯”的特征。这样,美国的中国革命研究出现了前述华志坚所说的社会史的视角。

随着社会史视角的导入,论者开始从区域社会(又名地方社会、地域社会)等角度审视革命。但是,一如整体的、自上而下的叙述存在问题一样,我们也不能将区域社会固化为一个恒定不变的空间或场域。作为日本提倡“地域社会论”的一员,岸本美绪指出所谓“地域社会论”实则具有“不确定性”^②。而杜赞奇关于“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al nexus of power)的研究,消解了以区域为单位建构历史叙事的意义^③。确实,如果不将区域社会之类的概念相对化,所谓革命的社会史研究很可能变成一个缩小尺寸的主导叙述,从而屏蔽了革命历史的复杂性和内在的紧张感。

回到革命实践层面,我所理解的社会史视野下的革命研究是从革命与民众的触点——“关系”和“事件”上着手的,反过来说,可以借助这些触点透视不同时期和情境下革命的特征。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里有一段很经典的话:“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④。“宣言书”申明行为的正当性,从“造反”到“革命”的话语转化即是正名的过程。“宣传队”旨在进行动员。动员谁?如何动员?需要从既存的人际关系网中寻找突破口。秘密会党曾经是革命与民众结合的媒介,而这个媒介随着革命斗争的展开最终必定被整合到匀质化的政治运动之中。反言之,如果没有这一过程,“播种机”播下的种子是不会发芽的,即使发了芽,也不可能成长起来。上面提到的《星火:中国乡村革命》是很有见地的一本书,但作者刻意忽略革命运动的匀质化过程,从而未能回答:既然革命是散落的星火,何以能聚成熊熊大

① Kathleen Hartford, Steven Goldstein, “Introduction: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Kathleen Hartford and Steven Goldstein, eds., *Single Sparks: China's Rural Revolutions*, Armonk, New York and London: M. E. Sharpe, 1989。

② 岸本美绪:“序”,载《明清交替与江南社会——17世纪中国の秩序問題》,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版。

③ Prasenjit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④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0页。